

1921-2011

中国共产党 九十年历程

90 Years' History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文化大革命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21-2011

中国共产党

九十年历程

**90 Years' History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文化在革命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九十年历程

第八卷 文化大革命

主 编：李 晨 李 健

副主编：张 华 韩泰华

编 者：罗欣欣 张国华 黄忠红 王彦东 谢春林
王宁宁 赵云连 陈 夕 张 翔 郑雅茹
高远戎 黄如军 韩 松 程 晓 杨 峰
李明军 韩 光 李正华 李建斌 陈立旭
蒋仲辉 刘建国 崔晓敏 金 砺 丁瑞生
贾 迪 李剑斌 魏雨晨 马明宇 李梦溪
蔡 泽 隋 勇 陈建志 谢金涛 梁桂华
梁鸿儒 董 云 董振军 韩 荣 韩 璐
彭 涛 傅 珍 雷经纬 蔡博识 谭仲谋
周万里 朱金智 孙 柏 潘英俊 闫 磊
孙立辉 武常海 孙长虹 于本成 李 俊
刘 花 郭海贺 王 波 张昌伟 王立丰
吴宝满 韩国生 苏志江 焦健民 乔 华
陈蕴涛 龙 锋 刘文锐 王 振 周敬青
张 曙 董乐山

统 稿：周敬青 余汝信

目 录

第一章 “文化大革命”的酝酿和发动

批判《海瑞罢官》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001)
《二月提纲》意在正确引导学术思想界批评讨论	(007)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出台	(016)
批判“三家村”深挖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	(022)
1966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026)
《五七指示》设计了理想社会	(030)
“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在全国播出	(035)
设立“中央文革小组”	(043)
“中央文革小组”的演变	(048)
派出工作组领导运动	(058)
毛泽东决定撤销工作组	(064)
八届十一中全会“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	(072)

第二章 内乱与反内乱

红卫兵运动的兴起	(077)
破“四旧”运动	(084)
全国范围的“大串连”	(092)
红卫兵运动走向分裂	(099)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05)
《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	(111)
维护生产秩序的努力	(117)
1967年初维持军队稳定局面的种种努力	(123)

第三章 上海夺权与二月抗争

“《解放日报》事件”	(130)
“安亭事件”	(138)
“文化大革命”引向工厂农村	(143)
“康平路武斗”事件	(152)
上海“一月风暴” 全面夺权的开始	(157)
“打倒一切”全面夺权	(166)
“三支两军”	(173)
《工业十条》的出台	(181)
反对江青一伙的“二月抗争”	(188)

第四章 武斗风行 全面夺权

所谓“揪军内一小撮”	(198)
武汉的“七二〇”事件	(204)
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	(214)
制止武斗反对派性稳定局势的努力	(234)
打倒“王、关、戚”	(246)
“文革”期间的教育改革	(253)
派出“工宣队”、“军宣队”	(262)
“上山下乡”与创办工人大学	(271)
“全国山河一片红”	(281)
兴办“五七”干校	(291)

第五章 九大召开 文革继续

“斗、批、改”运动	(298)
清理阶级队伍与“一打三反”	(307)
“斗、批、改”运动中涌现的“新生事物”	(313)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320)
筹备九大	(328)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337)
解放被打倒的干部	(348)

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形成	(356)
------------------	-------

第六章 林彪集团覆灭和周恩来批极“左”

设不设国家主席的一场争议	(364)
“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	(372)
林彪天才论的出笼和破灭	(380)
庐山政治风波	(387)
毛泽东追查庐山会议情况开展“批陈整风”运动	(395)
毛泽东南巡 继续追查庐山问题	(403)
“四三方案”出台	(409)
从《“五七一工程”纪要》到“九一三事件”	(414)
批林整风运动的开展	(421)
周恩来大力整顿经济秩序	(429)
大批老干部解放	(437)
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受到阻止	(445)
邓小平复出	(451)

第七章 科技和外交成就

南京长江大桥和宝成铁路建成通车	(459)
大型水利工程的先后建成	(466)
科技战线所取得的辉煌业绩	(474)
周恩来悉心指导核工业建设	(482)
“小球转动大球”的历史佳话	(491)
中美关系大门的打开	(498)
“波罗行动”	(506)
尼克松访华 中美联合公报发表	(513)
中日邦交正常化	(519)
中国恢复与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526)
中国代表团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	(532)

第八章 邓小平开展整顿工作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的筹备的召开	(537)
--------------------------	-------

“四人帮”的形成	(546)
江青等人掀起“批林批孔”运动	(555)
假借“批林批孔”掀起教育界动乱	(565)
江青假借“批林批孔”发起在军队的放火烧荒	(574)
“三个世界”划分理论	(583)
邓小平出席联大特别会议阐述中国的政治主张	(591)
严厉批评四人帮阻止江青的组阁企图	(598)
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曲折筹备	(607)
“风庆轮”事件	(614)
四届人大和政府的人事酝酿选举	(624)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	(630)
邓小平以“三项指示为纲”开展整顿工作	(635)
1975 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	(640)
评《水浒》反投降派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	(648)

第九章 粉碎四人帮 文化大革命结束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发动	(656)
教育整顿与《教育工作汇报提纲》	(667)
1975 年掀起的教育革命的大辩论	(676)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走向全国	(684)
江青等人借反击右倾翻案风制造夺权声势	(693)
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主要贡献	(702)
周恩来在“文革”中领导国防建设	(712)
华国锋走上党中央国务院重要岗位	(717)
“四五运动”的酝酿	(725)
南京事件拉开了“四五运动”的序幕	(734)
北京“天安门事件”	(743)
唐山大地震发生	(753)
“四人帮”阴谋夺取最高权力	(761)
反对“四人帮”正义力量的聚集	(772)
逮捕审查“四人帮”	(782)



批判《海瑞罢官》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围绕《海瑞罢官》掀起了批判浪潮，这件事成为“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导火线。

1958年冬，面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困难，毛泽东领导全党进行纠“左”口号这个过程中，感到党内党外都存在着违背实事求是精神的东西。正是认识到了这一问题，毛泽东提出了要敢于直谏。

历史剧《海瑞罢官》恰恰是吴晗为了响应毛泽东提倡直谏，提倡实事求是，提倡海瑞精神而创作的一部京剧剧本。海瑞的直言敢谏精神在50年代末期在纠正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中被毛泽东视之为重要的思想动力，号召全党都实事求是地将自己观察到的实际工作中的不足与错误指出来，帮助政府更好地制定政策。

1959年4月，毛泽东在上海召开八届七中全会期间，号召全党同志要讲真话，并特意提出要大家学习明朝宰相海瑞刚直不阿的精神。后来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和钱俊瑞把毛泽东这个意思告诉了著名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鼓励他写海瑞。吴晗不久就写出了《海瑞骂皇帝》等文章。同年下半年开始，吴晗应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的邀请将海瑞的故事改编成历史剧《海瑞罢官》，经过修改于1960年8月成稿。北京京剧团于1961年初公演。有关海瑞的文章和京剧一面世，就受到了读者和观众的欢迎，获得了很好的反响。

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所谓反党问题，是江青的发明。1962年7月6日，江青看了这个剧本和京剧以后，就发现了问题，她认为该剧“存在着严重的政治错误”，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她找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谈话，点名要批京剧《海瑞罢官》，但遭到拒绝。

此后在她开始过问文艺工作后，多次向毛泽东反映：《海瑞罢官》有问题，要批评。毛泽东开始不同意。1964年，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康生也向毛泽东说：《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有关，同彭德怀问题有关。这些对毛泽东产生了影响。同年下半年，江青找《人民日报》李希凡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被婉言拒绝。

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一份报告上批示：“各种艺术都是死人统治着。戏剧部门的问题就更大了……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1964年6月27日，他又作了一个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做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964年7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共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织领导开展文化界、学术界和历史界的学术批判，即在文化领域开展文化革命。彭真刚就任五人小组组长，江青便找上门来，要彭真组织批判《海瑞罢官》，还向彭真提供了一些包括吴晗在内的所谓“坏人”的名单，要一块批。“我看《海瑞罢官》没什么问题，吴晗这个人我了解，政治上很可靠。”彭真一口回绝。

1964年9月，彭真来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了当前学术界的情况，坦率地讲了自己的观点并批评了江青，他说：“江青搞京剧改革是有成效的，但她对文化界、学术界和历史界的看法太偏激，吴晗在政治上和我们党靠得很紧，未发现他有什么问题。大家都觉得江青有点左，而且喜欢强加于人。”

毛泽东也说：“我也不赞成她信口开河，她是她，我是我，她代表不了我。”毛泽东还就学术批判的事对彭真说：“这是你分内的事，由你决定。”

据此，彭真回到北京，迅速采取了一系列遏止学术批判随意政治化、随意点名批判的措施，一度紧张的空气缓和下来了。

江青见在北京施展不开拳脚，便采取迂回战术，南下上海。1965年2月，江青找到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组织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姚文元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整个写作活动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其间，江青频繁活动于北京上海之间，秘密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目的是打北京市委，给彭真来个措手不及。

《评〈海罢〉》共分四部分。在前三部分中，文章歪曲早已明载典籍的



史实，攻击吴晗为塑造一个决定农民命运的英雄不惜改写历史。毫无根据地把他在1960年为响应毛泽东提倡海瑞精神而写的《海瑞罢官》一剧中描述明朝历史上海瑞所进行的“退田”、“平冤狱”，同1962年受到指责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对剧本作了猛烈的政治攻击，说它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这种阶级斗争的反映。《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文章罗列的这些罪名都是根本无法成立的。

文章实际上涉及1961年以来中央领导层在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上的分歧，攻击的矛头并不限于吴晗。江青要搞的批判文章是想让读者明白，吴晗1959年写有关海瑞的文章时，就“未卜先知”，要为发生在1961年的“单干风”和1962年的“翻案风”喊冤叫屈。对于这一点，吴晗在11月14日说：“姚文元说我的《海瑞罢官》作品产生于1961年‘刮风’的时候。这是错了。我的《论海瑞》发表于1959年9月21日的《人民日报》上。《海瑞罢官》是1960年写的，我没有那么大的本领预见到1961年要‘刮风’。”他表示：不准备写答辩的文章，正给市委写个报告，直接送给彭真同志。还说：“姚文元这样批评我，我也不怕。不过我觉得这样牵强附会的批评，乱扣帽子，这种风气很不好，谁还敢写东西，谁还敢写历史？”^①毛泽东看了这篇材料后批道：“我都已看过，一夜无眠。”接着，在《关于姚文元评（海瑞罢官）文章反应续闻》里面说：“翦伯赞认为，现在学术界的顾虑并未解除，姚文元乱来一通，不利于百家争鸣。”^②毛泽东看后在旁边画了三个圈。到上海后，他得知北京各报没有转载姚文元文章，就要上海人民出版社将这篇文章印成单行本，向全国发行。可见毛泽东是支持姚文的。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写作，是在一种极不正常的保密状态下进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除毛泽东之外无人知道。张春桥找来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编委姚文元执笔，竭力逢迎江青意图。姚文元每改一稿都由张春桥假修改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之名，把稿件夹在《智》剧的录音带内由飞机送往北京审阅。到1965年9月文章初步定稿后，才在小范围内征求意见。最后经毛泽东修改、批准发表的已是第十一稿。定稿之前数稿虽然都在上海市委印刷厂付印，但中共上海市委领导成员除张春桥之外一概不知。定稿后，市委得知该文将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立即提出应在文章发表前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彭真通气，但被张春桥以江青的“指示”为名竭力阻挠，并对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其他负责人封锁消息。

文章发表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震动，先是华东六省一市，尔后是全国其他省市的党报纷纷转载。思想文化界陷入空前混乱之中。

地方报纸公开点名批判北京市的副市长，彭真事先不知道，连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都被蒙在鼓里。彭真厉声责问张春桥“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连续几天，彭真连续召开座谈会，征询意见。通过摸底，彭真得出结论：《评》文不得人心。他下令：“北京各报一律不准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人民日报》和北京其他各报在十多天内没有转载。本来，上海报纸发表的文章，其他地方的报纸完全有权自行决定是否要转载，但是这加深了毛泽东对北京市委和中央一些主要领导人的怀疑和不满，认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彭真是吴晗的后台，认为北京市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后来毛泽东对此也有过评论：“文章（指姚文元——引者注）发表以后，各省都转载，北京不转载。我那个时候在上海，后头我说印小册子。各省都答应发行，就是北京的发行机关不答应，因为有些人靠不住嘛！北京市委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市委。”^③可以看出，毛泽东已把批判的矛头进一步指向以彭真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

中央书记处在大体上了解姚文元发表的背景后，指示北京报纸予以转载。

1965年11月29日、30日，北京各大报纸先后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27日，在巨大的压力和彭真的劝说下，吴晗违心地写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刊登在《北京日报》显著位置上。

江青发射的“重磅炸弹”终于在北京“全面开花”。在江青进一步的鼓动下，全国各地的“批判家”纷纷跟进，毛泽东要求彭真向上海的同志学习，把批判《海瑞罢官》的斗争引申一步。但是，由于彭真了解《海》剧的来龙去脉，根本与“单干风”、“翻案风”不相干，不赞成上纲上线，于是还只是把它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

由于各地报纸在转载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时都在“编者按”里强调是“学术讨论”的性质，所以这颗“重磅炸弹”并没有达到江青等人预先想要达到的效果。特别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恼怒的有两件事：一、姚文发表之后，当时彭真同志主持下的北京市委对它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北京市委专门成立调查组，对吴晗同志的政治历史作了调查，申明吴晗同志历史清白，与彭德怀同志既无工作关系，又无私人联系；北京市委对上海市不打招呼在报纸上公开点名批判北京市一个副市长提出抗议。二、吴晗



发表的那篇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文中除了违心地承认错误之外，还大量引用史料同姚文元据理力争，并用肯定的语言申述自己“20多年来一直在党的教育、培养、关怀下，政治上的阶级立场是站稳了的”。社会各界对吴晗同志的不幸遭遇也深表同情，社会舆论明显地向吴晗同志一边倾斜。周总理也曾经对吴晗说：“吴晗老，我给你换个工作怎么样？”由于形势险恶，周总理的保护措施没能得到实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看到形势对他们不利，于是又开始策划新的阴谋，竭力把对吴晗的批判升级。江青密令关锋、戚本禹等悄悄赴沪，与张、姚多次密谈，商量对策；回京后又同康生详细密谋。1965年12月8日，戚本禹首先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为革命而研究历史》。这篇文章打着批判胡适的幌子，把矛头指向吴晗、翦伯赞，与姚文实行“南北夹击”。

批判罗瑞卿的上海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又把注意的重点转回到批判《海瑞罢官》上来。

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陈伯达、胡绳、艾思奇、关锋、田家英等人谈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哲学问题和教育问题时说：“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戚本禹的文章（指批评翦伯赞等历史观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几年，青年有进步，就是一些老教授没办法。吴晗老当市长，不如下去当个县长好。”^④

这些话，更进一步加重了批《海瑞罢官》的政治分量，到1966年初，这一批判发展到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形成思想文化领域广泛的批判运动。对《海瑞罢官》（后来扩及一切对海瑞的宣传和评论）怎样表态，几乎成为判断是否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唯一标准。

与此同时，江青于1966年1月21日从上海赶到苏州，与林彪面晤，进行新的交易，用江青的话说就是去“请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江青要借助林彪的支持，攻北京那些“不听话”的人了。

姚文元这篇文章的写作过程。毛泽东一年多后曾对外国朋友讲过：

“这场斗争也准备了一个时期。前年十一月，对一个历史学家吴晗发表了一篇批判文章。这篇文章在北京写不行，不能组织班子，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们搞了一个班子，写出这篇文章。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先告诉我要批评。他们在北京组织不了，到上海去组织，我都不知道。

文章写好了交给我看，说这篇文章只给你一个人看，周恩来、康生这些人也不能看，因为要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⑤

毛泽东同意发表这篇文章，而且给予极大的重视，表明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心已经下定。他把发表这篇文章看作是“甩石头”，用以打破他所不满的那种沉寂局面。这便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注释：

①《光明日报情况简编》第362期，1965年11月15日。

②《光明日报情况简编》第367期，1965年11月20日。

③⑤毛泽东同卡博、巴卢库谈话记录，1967年2月3日。

④毛泽东同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谈话记录，1965年12月21日。



《二月提纲》意在正确引导学术 思想界批评讨论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上纲上线，立足政治批判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出现大量不同意见。

对此，彭真、北京市委、中宣部不赞成这样的政治批判。11月28日，当北京市委书记邓拓说到“吴晗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时，彭真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12月14日，彭真对吴晗说：“你错的就检讨，对的就坚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12月22日，当毛泽东再次提出吴晗文章的要害是罢官时，他又当面对毛泽东说：“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联系。”^①

彭真主张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按照彭真的意见，1965年12月12日，《北京日报》和《前线》杂志发表了邓拓署名向阳生的文章：《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从学术问题的角度对《海瑞罢官》作了批判。12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主持写作的署名方求的文章——《〈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这是《人民日报》第一篇在这个问题上的表态文章。“方求”也试图把《海瑞罢官》当作一个学术问题来讨论，并将吴晗的问题限定了“社会思潮”的范围内，而不是从政治立场上进行批判。

12月27日，《北京日报》发表了吴晗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吴晗首先给自己1959年和1960年所发表的海瑞文章，排了一个时间表，以论证自己写《论海瑞》“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对假冒、歪曲海瑞的”，以辩解《海瑞罢官》同“单干风”、“翻案风”无关。同时，吴晗也作了自我批评，《论海瑞》这篇文章，在论点上，在评价上，缺点、错误是很多的，特别是缺乏阶级分析。他还说：“至于《海瑞罢官》问题就更严

重了”，“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现实。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指导着，而不是无产阶级思想在指导着。”“总之，没有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没有用一分为二的科学方法，没有用历史唯物主义来正确地评价人物和事件，而用的是形式主义的方法，片面地、绝对地、主观地来描述海瑞和农民群众，这是思想问题，也是阶级立场问题，错误是严重的。”但这样的自我批评与毛泽东的判断相去甚远。

在《海瑞罢官》的实质是罢官的论断出来后，1966年初，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上升为了政治批判，并很快发展到对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等社会科学领域全面的“揭盖子”，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批判吴晗以及其他一些同志的文章，政治性批判急遽升温，在全国范围内把这场批判运动推向高潮。形成了紧张的学术政治气候，许多文章上纲上线，造成知识界人士心情紧张，惶惶不安。

1966年1月13日到17日，戚本禹写成《〈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本质》，关锋、林杰写成《〈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送给中宣部，其中两篇文章是关于“要害是罢官”的，并且上纲上线很高，“要害”讲得很明显。戚本禹在文章中说，吴晗1959年6月写的《海瑞骂皇帝》，“实质上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锤鼓助威”，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向党进攻的“开场锣鼓”；而他1961年1月写的《海瑞罢官》，则是“为一小撮被人民‘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叫屈，它的真正主题是号召被人民‘罢官’而去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东山再起”。文章中还说，吴晗用“兵部尚书”的历史人物来影射，并特地注明，“兵部尚书”就是“国防部长”，就只差没点彭德怀的名字了。

与此同时，江青、张春桥收集证据，他们则把不同意姚文元观点的大量反对意见都列入“右派言论”，借此对知识分子，特别是中老年知识分子进行打击。

在批判《海瑞罢官》开始以后，围绕着如何进一步开展学术争鸣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如何对待和解决这些问题，当时中宣部在北京报刊界进行了一系列讨论，并收集了各方面的情况材料。

1966年1月2日，彭真在人民大会堂召集文教、报刊、北京市和部队有关负责人会议，由胡绳传达毛泽东12月21日的谈话精神，主题是提倡读马、恩、列著作，着重谈了哲学问题，也谈到了对《海瑞罢官》和翦伯赞



史学观点的批判问题。

彭真强调“放”，全面地“放”，索性让大家把心里话都讲出来，讲透讲够，然后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在“放”的同时，各种问题扯得越宽越好。并说，“政治问题两个月以后再说，先搞学术。”陆定一在会上也说，先搞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以后再搞，这有利于思想的展开。可是，康生却在会上说：批判吴晗要同庐山会议结合起来。彭真特别指出：“任何人的文章都可以一分为二。我在上海讲，你《解放日报》、《文汇报》自己也发表过不少错误文章，也应该清理清理。对于他们的错误，中央报纸也可以批评。可见，彭真即使在毛泽东谈了《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之后，仍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主张把根本和彭德怀毫无关系的吴晗硬和庐山会议扯在一起。

为了不因《海瑞罢官》引起学术界、思想界的大混乱，彭真等人认为有必要制定一个相应的文件，并采取一定的措施，使这场讨论有序进行。

1月底前许立群将《北京六个报纸杂志编辑部负责同志座谈会关于〈海瑞罢官〉讨论的情况和问题》、《许立群给彭真的一封信》、《汇报关锋等同志四篇稿件政治性的提法》、《关于郭沫若同志的一封信的汇报》、《关锋同志在1962年写的几篇杂文》、《邓拓同志在1962年写的一篇杂文》、《关于海瑞上疏和海瑞背纤的材料》等七篇材料上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其中有一份是有关1月7日召开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红旗》杂志、《前线》杂志、《新建设》杂志等报刊负责人座谈会的简报，是由林涧青、龚育之整理而成的，主要内容是许立群的总结讲话。简报主要内容包括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何执行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的指示。前提是执行是“跟”，但关于批判吴晗政治性的文章，上纲的程度，发表的数量及发表的时间都不好掌握。第二个问题是批判的有关步骤和范围问题。如有的报纸就主张《海瑞罢官》问题、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历史剧问题、道德问题一个一个来是否合适。而在范围上，批吴晗的历史观必然涉及翦伯赞，对吴晗道德观的批判，也会牵涉到冯友兰和朱光潜，这些问题如何处理？还有其他报纸，如《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体育报》是否参加和怎样参加讨论。第三个问题是怎样面向群众。读者反映文章太长、太深，没法看。第四个问题是文章的数量和质量问题。参加讨论的各报都反映现在的文章有质量的不多，版面接不上。这四个问题，从后两个问题看，都说明群众和干部对这场争论并没有兴趣，写文章的人不多，

真正有研究的专家学者基本上不写，干部大多也不关心，认真看文章的人不多。

上述请示包括其他六份请示材料，上面都没有答复。正在这时，发生了郭沫若正式提出辞去中国科学院院长及其他一切职务的事件。这件事和这场大批判紧密相关。事件本身恰恰说明，无限上纲，没有章法的批判运动，必然要导致混乱，导致一批专家学者人人自危。这将会对党的事业造成重大的损失。作为主管文化工作的彭真、陆定一、许立群诸位，当然有责任制定一个文件，提出几条规定，来匡正这个批判运动。这就是《二月提纲》产生的历史条件。

在呈送上述七份材料时，许立群给彭真写了一封信，谈了几个问题：一、肯定对吴晗的批判已取得成效，认识到不只是学术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但在报刊上的批判，揭露政治上的错误，如何掌握？有的文章上纲很高，说吴晗和彭德怀是一伙，并把吴晗比成蒋介石，这种文章发表好不好？二、反映有许多人提出要把郭沫若、范文澜拉出来批判，中宣部已通知不刊登批评郭老、范老的文章。另如关锋等都写文章批判吴晗的道德继承论，而他们在1962年也在报上发表过影射中央的文章。这些问题，如果只批评别人，不在适当时机采取适当方式，在党内清理一下自己的错误思想，一旦被人指出就很被动。而对谭元寿、马连良等京剧演员则不赞成公开登报检讨。因为，这方面的人很多，而且不好要求他们负太多责任。三、说批判文章已发了不少，今后应当注意讲求质量，如果做不到，即按“宁可少些，但要好些”的精神办。许立群信写好后，即念给林涧青、龚育之听，随后呈送彭真。

《二月提纲》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分析这些情况的基础上形成的。

2月1日，彭真把许立群的这封信及七份材料送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陆定一、吴冷西每人一份，并说明拟于3日召开五人小组会议讨论后向中央提出意见。5日看过材料的毛泽东将材料批给江青：这批材料阅后，暂存你处。

1966年2月3日，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彭真根据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圈阅的意见，在北京召集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有关方面负责人许立群、胡绳、姚溱、王力、范若愚、刘仁、郑天翔列席了会议。彭真在会上说：经查明，吴晗同彭德怀没有关系，因此不要提庐山会议，不要提《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